



□ 赵 亮



《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是1951年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邓小平发表的文章的节选，后收录于《邓小平文集》上卷。在文中，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来历史作了简要回顾，重点强调了“紧密地联系群众”这个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深刻论述了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方法的重要性。重温这篇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党与群众的深厚联系是历史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与生俱来的。邓小平指出：“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与中国人民建立起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屡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但一时却难以找到正确的解放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邓小平指出：“惟有我们党向他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惟有我们党依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规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员正是在奋不顾

身、前赴后继的战斗中，逐渐成为“群众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这也建立起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如一日”的信赖和支持。特别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建立深厚的联系，这与毛泽东的贡献密不可分。回顾党的历史，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建立深厚的联系作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以《实践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篇著名文献为例说明，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等来教导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克服了各式各样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树立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正确的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方法。邓小平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这使得党的方针符合群众的要求，党的口号能够立即变为群众的行动，领导群众战胜一切困难，扫除一切障碍，从而取得圆满的胜利。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历史，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的党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

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体现在人民革命运动和事业的方方面面。

密切联系群众，有助于把人民军队锻造成为强大的“战斗大军”和“政治大军”。邓小平认为，人民军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善于联系群众的榜样，这主要体现在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方面和军民关系方面。一方面，由于在集中的基础上，实行了恰如其分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的原则，从而彻底清除了旧军队的军阀主义，巩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增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军民团结的原则，注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保护群众利益，人民军队“既发动了群众，又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从而同群众建立了鱼水的联系。

密切联系群众，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推动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善于从革命实际出发，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作为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依据，并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人民群众，这有助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密切党群联系，“巩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此外，我们党还善于根据群众运动实际来检查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立场观点和工作作风，有利于及时发现缺点，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纯洁党的队伍，“加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是争取群众、夺取胜利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相继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邓小平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因为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完全符合于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贯彻和发挥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密

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在运动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最终取得了一系列斗争的胜利。

党与群众要“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奋斗，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万事大吉，在我们党的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比如，我们的地方组织“常常要犯一些错误”，我们党的组织成员还存在一些弱点，一些新党员不懂得革命理论和方法，少数党员缺乏对劳动群众的感情、脱离群众，有些党员缺乏系统的理论修养，有些党员骄傲自满、不同群众商量等等。

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指出，克服这些弱点，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党员水平，纯净党的组织，是“一件比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封建势力更为艰巨的，对于保障革命前进更为根本的工作”。应该怎样来做呢？对此，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进一步地布尔什维克化，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要求。

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因胜而骄，而应谨守着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保持我党的光荣传统，紧密地联系群众，引导群众走向更大的胜利。”密切联系群众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正确结论，也必将启示着我们不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需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21年第9期聚焦“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约请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撰文阐释。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基础，主张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应该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西方“普世价值”强有力的批判，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霸权，纠正了西方舆论界在价值观上对中国的抹黑和贬损。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有着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只有坚守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变成现实。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阮宗泽在《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指出，大变局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契机。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洞察世界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倡导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展现了宏阔视野和睿智的领导力。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是破解当今时代难题的钥匙，又是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正日益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并提供公共产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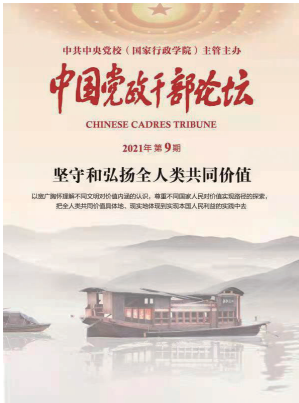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高祖贵认为，在顺应和引领世界大势、明确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响应时代之问和人类发展之需，从价值的高度提出融通中国与世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初中时代主题、公平与正义唱响时代强音、民主与自由锚定时代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要理念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贯通了中华文明与人类各种文明之间的价值追求，为推动世界历史车轮朝着光明的目标前进提供了价值遵循。

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张军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进行了阐释。文章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21年第9期聚焦

□ 范丽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价值文化和基本价值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依据和意义来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内生逻辑的发展结果，意味着我们要努力探索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意义、完善中国价值体系，突出中华文明主体性、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源于中国惠及世界的价值体系。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尊重各国历史、尊重各国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是世界价值领域深刻的哲学革命，有着深远的文明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当代政研究平台研究员汪亭友在《从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的必然产物，它与西方“普世价值”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语境中的“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术话题，而是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后赋予特定政治含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期，我们要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危害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产物，符合全人类共同愿望。



尊信国史 明理求真

——章太炎的治学之道

□ 孙道壮

章太炎（1869—1936年），字枚叔，后易名炳麟，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等，著述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儒术新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他的思想经历和学术著述中饱含着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治学理念、治学品格和治学方法。

以历史引起爱国心

在治学理念上章太炎主张以历史引起爱国心，他强调，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繁衍发展，就在于其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就在于其能够在自身所拥有的数千年丰富的生产、交往与组织经验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质，这决定了其在存亡危机时刻能够成为具有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的民族，而对中华民族流动与变迁过程的记录，也正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书写传统。他指出，治学虽有取舍，但却以保存民族特性最为重要，而要保存民族特性、发扬爱国志趣，就必须要有保存自身的历史，学习自身的历史。

坚持“以史切要”。章太炎十分重视在史论结合的双重维度上阐发历史研究的内在思想主旨和以史切要的政治主题。就史学而言，他基于实证性和批判性的笔法探求历史背后的事理，从而创

立了以史解经的“新史学”；就史论而言，他以反思性评述对社会行为所作出的历史性阐释，蕴含着构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连续性叙事的深刻立意，呈现出来的是有关民族特性的精神表达。他反复强调历史作为切要之学具有重要意义，是维系民族特性的核心要素。这一爱国之思，始终贯穿于其史学和史论的互应之间，贯彻至其整个学术生涯之中。

倡导“以史教文”。章太炎重提“六经皆史”，他所提的“史”是“史学”而非“史料”。他认为今文经学的根本危机在于“史”的系统地失信，对“文”的危机的拯救可以通过否定抽象化的“文”和绝对化的“信”，将经统一于史中来实现。这一“以史教文”的道路，不仅为传统经学研究重新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而且在“中国文化应往何处去”的重要关口，为中国的学术和文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思路。

以百姓心为心

在治学品格上章太炎主张“以百姓心为心”。他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这一真俗两行之路，始终贯穿着他对于“真谛”与“俗谛”、“真情”与“俗情”相互贯通与融合的思考。在这一思考中，他不断向着“俗谛”和“俗情”倾斜，并且提出了真俗本来不二的观点，这不仅使他的治学之路具有了一

种曲径独行的别样色彩，而且也使他的治学思想具有一种心怀百姓、爱国忧民的内在品格。

章太炎一生都在致力于追求“合致用与求是二者治于一炉”的治学目标。在1932年发表的《论今日切要之学》中，章太炎疾呼：“合致用与求是二者治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他主张“学在求是”“用在亲民”，因致力于“求真之是”所以更加深刻地领悟“用在亲民”，因致力于“用在亲民”所以更加努力“求真之是”，这成为章太炎治学品格的集中体现。他强调“大独不群，不群非独”，因为他真正领会到了“群”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维系一个大的共同体，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安顿；真正领会到了只有从“小群”中毅然独立出来，才能投入到拯救“大群”的事业中去，才使得“大独”具有了极强的实践品格，这一实践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造福于“大群”，以在肩负起救国图存重任的同时，使广大平民的利益免遭侵犯。

追求实事求是之学

章太炎在治学方法上主张语必证实、说必尽理，反对“臆造新解”。文史学家庞俊在《章先生学术述略》中曾指出：“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其谨严如此，是之谓实事求是之

学。”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对乾嘉之学的衰微感叹道：“斯四术者，所包阔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淆乱者。”从文中来看，他所提到的“四术”皆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学，从他对宏观经学的界定“六经皆史”而言，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可以扩大到他的整个治学过程。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作出阐释，但却将其内涵表述为“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妍，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也就是在研究中应该达到对“是”等于“事实”的客观考证。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疑其难证”和“忠恕”之法。“疑其难证”指在没有足够的以文字可考的史料为证据的基础上“疑古”。“忠恕”之法指以物为物，以己推人，“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得理者，忠之事也”，“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恕之事也”，“忠恕”之法是实现“事实”与“是”相等同的关键。章太炎在具体的史学研究过程中对上述方法实践运用，不仅将六经还原为了古史，而且还引入了逻辑的方法，使其超出了传统经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实现了史学研究中国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他在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时对于这一治学方法又各有侧重，将二者之间的学术旨趣具体地呈现于不同的现实实践中。